

红湖人文学科丛书

区域文学的律动

《天山》流变与新疆当代文学

欧阳可惺 钟敏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红湖人文学科丛书

区域文学的律动

《天山》流变与新疆当代文学

欧阳可惺 钟敏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区域文学的律动:《天山》流变与新疆当代文学/欧阳可惺,钟敏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10

(红湖人文学科丛书)

ISBN 978 - 7 - 5668 - 1111 - 0

I. ①区… II. ①欧…②钟…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新疆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4465 号

区域文学的律动:《天山》流变与新疆当代文学

著 者: 欧阳可惺 钟 敏

策划编辑: 史小军

责任编辑: 李 艺 郑晓玲 黄 球 高 洵

责任校对: 黄惠波 范小娜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48 千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

定 价: 49.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欣闻欧阳可惺教授《区域文学的律动：〈天山〉流变与新疆当代文学》一书即将出版。我与欧阳可惺教授相识于乌鲁木齐。前几年，我在石河子大学做兼职教授，可惺教授请我到他供职的新疆大学中文系做讲座，在新疆大学宾馆住了一晚，还到了一家极具维吾尔族特色的餐馆用晚餐。2005年，我第一次与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去乌鲁木齐访问，逛过街市，尤其是二道桥，既惊讶那里与内地反差极大的少数民族文化，也被一种潜在的浪漫情绪所感染。但我知道，可惺教授是四川人，生长在乌鲁木齐，所以待再见到他的时候，我几年前的惊讶感仍未消除。我与好友陈晓明教授一起在石河子大学兼职三年，去过一些地方，也曾幻想写点新疆当代文学的相关论文，可惜学术积累有限，只给《南方文坛》写过一篇很随意的印象式文章。

《区域文学的律动：〈天山〉流变与新疆当代文学》以《天山》杂志（更改过多次刊名）为中心，详述了该杂志的历史流变，该杂志是如何参与新疆当代文学的初建、转轨、恢复等复杂进程的。由此，通过新疆本地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杂志，观察新疆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让读者能够一眼看清当代史巨变是怎样辐射到数千里之外的新疆的，同时，新疆本地文化的特殊性，又怎样以自己的方式应和这种强力辐射，并呈现出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学风貌。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仅仅在文学史的范畴里做文章，还把研究视野扩大到“地域文化”、“文化空间形态”等更大的领域，试图在这个大背景下对一家杂志与新疆当代文学的历史纠缠作有效的学术定位，作出自己富有探索性的理论阐释。除上述研究方法和角度，该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它丰富的第一手文献。如果我们想对《天山》有一个总体认识，这部著作提供的丰富资料就已经足够。文献资料在我看来，就像考古现场最繁琐细致的工作，一部看似无心的断简残编，一件破碎的瓷器，一截布满历史沉埃的木桩，都值得特别留意。猜测其中的用心，感受它与周围发掘物之间似有似无的联系，甚至由此作更大胆的推想，联想它走出了这个墓坑，走出了这个朝代，展现其与另一个遥远朝代

2 区域文学的律动：《天山》流变与新疆当代文学

之间的某种文化血脉联系。如此等等，都会耗费研究者大半生的岁月，也许最后都毫无所获。如福柯所说，出土文物或者图书馆的资料文献都是散乱地堆放在那里的，是杂乱无序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将它们重新编排在一起，用自己的眼光去恢复当年的现场，按照自己的意图作出新的历史叙述。我想本书作者一定对这家杂志的历史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认识，他们如此安排各个章节，也一定有自己的考虑，读者当有明辨，无须我再多说。

最后我想再补充一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完整性，仅仅评说“内地文学”是无法全面体现的。内地之外广大区域的少数民族文学及那里的汉族当代文学，以及这些区域文学的研究成果，若干年后，想必会引起文学史家越来越多的注意。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的参与和对话，以内地为中心的当代文学史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用长远的历史眼光看，这种说法并非个人想象，然而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都还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书的学术价值，就大大地凸显出来了。

程光炜

2014年7月1日于北京亚运村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 一、关于《天山》文学期刊的名称与研究思路 /2
- 二、新疆当代文学生成前的社会结构性背景 /4

第一章 《天山》(1956—1961) /18

- 一、《天山》的创刊 /18
- 二、《天山》时期的新疆文学发展状况 /27
- 三、关于“群众创作”和“人性论”的讨论 /68

第二章 《新疆文学》(1962—1966) /83

- 一、《天山》改刊为《新疆文学》 /83
- 二、《新疆文学》时期的新疆文学发展状况 /91
- 三、关于《司机的妻子》的讨论 /121

第三章 《新疆文艺》(1974—1979) 与《新疆文学》(1980—1984)
/140

- 一、《新疆文艺》(1974—1979) /140
- 二、《新疆文学》(1980—1984) /173
- 三、“新边塞诗”的崛起 /188

第四章 《中国西部文学》(1985—2001) /201

- 一、《新疆文学》改刊为《中国西部文学》 /201
- 二、《中国西部文学》时期的新疆文学发展状况 /209
- 三、关于“西部文学”的论争 /252

2 区域文学的律动:《天山》流变与新疆当代文学

第五章 《西部》12年(2001—2012) /260

- 一、《西部》的变革与期刊经营(2001年4月至2010年4月) /262
- 二、《西部》的文学性表达(2001年4月至2010年4月) /275
- 三、《西部》纯文学期刊恢复发展之路(2010年5月至2012年12月) /283

第六章 《天山》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292

- 一、作为少数民族文学载体的《天山》 /293
- 二、国家主流民族团结政策与《天山》 /325
- 三、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天山》 /331

第七章 从《天山》到《西部》进程中的新疆当代文学制度初考 /352

- 一、新疆当代文学的作家构成和“编辑”身份 /354
- 二、20世纪90年代之前新疆文学的传播方式和文学期刊的生态环境 /363
- 三、20世纪90年代之后新疆文学生态环境的“恶化”和文学场分析 /366
- 四、新疆当代文学期刊折射出的文学政策问题 /369

结语:《西部》的未来发展 /381

- 一、兼顾文学性和市场性 /381
- 二、关照读者与自身传统 /386

参考文献 /389

后 记 /392

绪 论

中国新疆当代文学的研究，一直是一个令人焦灼而又极富诱惑力的话题。对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人来说，由于地域遥远而被相对边缘化的新疆文学，实际上存在着大量鲜活的文学研究对象，这些由新疆多民族文学作家创作完成和多民族文学读者阅读接受的文学事实搁置在研究者的面前而没有被客观认真地予以对待，这不能不令人焦灼；同时，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作家的鲜活文本又是那样的充满诱惑，使文学研究者往往发现后欲罢不能，总有一种想深入探究的冲动。

笔者长期生活在新疆，对新疆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学状况多有触感和感受。在历史上，相对中国内地而言，“南方是一个开阔并有无限深度的边疆，而北方则是一个想要关闭却未能真正关闭的边疆”^①。新疆作为中国西部的边疆，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特点的区域。在拉铁摩尔看来，将边疆看作独立意义的地理单元，其中的社会形态具有单独考察的价值。在历史变迁流动的过程中，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区域，新疆始终都主动包含或接受、保持着多重的社会关系。当我们考察新疆的任何一个社会事件、思想、思潮或者文学事实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总是十分在意：不要人为地分割现实存在的这种多重性的社会关系。在新疆的社会生活中，区域性的跨体系社会关系是一种包含着各种历史必然或偶然性事件和其他形态的交往而形成的横向联系。不管是自然历史进程中的区域性的新疆，还是在现代社会历史进程中作为边疆的维吾尔自治区的新疆，其总是与国家中心、与他者、与其他区域发生着多重的横向联系。显然，在这样的横向联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区域研究的历史思考中心是需要确立一个时间维度的，而正是这个时间维度把内地、边疆区域之间多种关系的重叠性、模糊性、流动性、稳定性都并置在历史思考的中心。这个时间维度是一种“横向时间”。新疆当代文学是一种“横向时间”的文学，对新疆当代文学的认识和考察必须在这个时间断面中去进行，在其中的文学事实面前，我们可以发现诸

① [美]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41。

多的历史关联性，它们时而交叉、平行，时而凸显。但是，时过境迁，诸多的文学作者已远离我们而去，诸多文学文本也被搁置忘却，我们无法从当下的时尚文本中去窥视过去的文学生态，所以当我们认识和考察 20 世纪以来的新疆文学时，我们首先无法回避的是形成新疆文学事实的最基本平台——作为现代文化传媒的文学期刊。

一、关于《天山》文学期刊的名称与研究思路

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文学期刊史。文学运动、文学流派的形成，作家确立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离不开文学期刊。可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大环境中，对新疆当代文学的研究多年来却一直处于沉寂的状态。同样，《天山》作为新疆作协主办、新疆文联主管的文学期刊，曾引发了全国性的“新边塞诗”、“中国西部文学”的讨论，它是新疆当代文学构成中重要的期刊之一，却一直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在新疆当代汉语期刊中共有两个《天山》。第一个《天山》是本书所要研究的期刊，它创刊于 1956 年 10 月 25 日，是文学月刊，编辑者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天山编辑委员会，出版者是新疆人民出版社，从 1957 年 1 月号起发行，刊物代号是 58-9，这个代号经由《新疆文学》（1962—1966）一直使用到 1966 年。1974 年《新疆文学》以《新疆文艺》的刊名复刊，刊物代号变为 58-65，并一直使用至《西部》。第二个《天山》创刊于 1980 年 6 月，是在 1972 年试刊的《天山文学丛刊》的基础上正式创刊的。这个《天山》是乌鲁木齐文联、作协主办的文艺季刊，全国发行。该刊于 1982 年在自治区调整刊物时停刊，1986 年 7 月复刊后为双月刊，1989 年 12 月再次停刊。这个《天山》的刊物代号也是 58-9，但是它与 1956 年创刊的《天山》并没有传承关系。

本书研究的《天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型的汉语文学期刊。它创刊于 1956 年 10 月，1962 年 1 月号更名为《新疆文学》，1966 年 7 月停刊，1974 年 1 月号以自治区文化局局属文艺创作研究室主办的《新疆文艺》为名复刊，1980 年 1 月号恢复刊名《新疆文学》，1985 年 1 月号更名为《中国西部文学》，2001 年 4 月号又更名为《西部》至今，2010 年 5 月号《西部》又进行了改版。笔者想通过对这段时间《天山》变动过程所有相关资料的分类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天山》的文学现象、文学事件以及涌现出的重要作家作品、代表性的文学评论，力求描述、说明《天山》对新疆当代文学的构成和影响、对当代文学思潮的体现、对新疆当代作家队伍

的培养和与内地文学相比体现出的边疆意识和多民族意识,争取为新疆当代文化和文学的研究提供可供回溯、参考、借鉴的个案。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研究热潮,而大众媒介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和渗透更是研究的重中之重,对杂志与报纸副刊的研究成了新的学术关注点。相对于单行本的书籍来说,杂志与报纸副刊不仅更能突出文学的原生态,而且可以直接揭示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动向。在现代文学中,杂志与报纸副刊这类大众媒介由书局、编辑、作家所控制;在当代文学中,则由政党政治文化和国家所控制,对文学创作的政治性监督成了其主要职责。^①“‘当代’对文学期刊的重视,不仅仅在于能及时地为作家提供刊发新作的场地,而且也是将全国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加以集中、有序地管理,以建立有着统一路线的文学格局所必需的。因此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十分重视刊物编辑出版工作。”^②显然,对新疆当代文学^③的研究也必定绕不开对新疆当代文学期刊的研究。

因此,对《天山》的研究不仅是一种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在新疆本土文学的实践,也是对新疆当代文学研究的完善和补充,更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研究的补充。从《天山》杂志发展、流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整体的中国当代文学一部分的新疆当代文学是如何在诸多的政治、阶级、路线斗争中,在与商品市场、多种文化、民族集体和个人主体的复杂关系中蹒跚学步、成长发展和日趋成熟的。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疆当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多种重叠性、模糊性、流动性关系;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区域性文化差异决定的新疆文学与内地文学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作为区域文学自身的特征而长期存在,它要作为自身凸显,但是,它又要以自身的凸显姿态进入中国当代文学整体的公共领域,在追求公共性的文学存在过程中,它与其他区域文学的不同都因其各自特征的稳定性而被并置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思考视野之中。同

① 程光炜.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5.

② 洪子诚.《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程光炜.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62.

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当代文学是由多个民族的文学共同构成的,但由于本书所研究的《天山》是汉语文学期刊,为了叙述方便,本书所指的新疆当代文学主要是指新疆当代汉语文学。当然,《天山》并非仅仅是汉语文学期刊,在《天山》上刊发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也非常多,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研究新疆当代文学必定离不开《天山》。

时，我们也在这种稳定性与并置性的具体文学事实里，看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整体性面貌下的多样性存在。

怎样通过文学刊物认识和研究新疆当代文学？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研究新疆当代文学的最佳方法莫过于过程研究。过程研究的目的是还原事物自然发展历史的真实，而提高还原真实度的具体研究方法是个案研究。实际上，这种个案研究的具体研究方法确立后，有助于我们不再把中国当代文化的逻辑演变仅仅理解为某种平面式的纵向推进。

同时，在笔者看来，新疆当代文学是一个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空间形态”，对这种“文化空间形态”的文学刊物的认识也必须以过程研究为主，以个案研究为主。从《天山》不同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影响新疆当代文学的制度性规则、文学场的力量，也可以看到模糊性、流动性、滞后性并置的文学事实存在。同样，过去的《天山》究竟在新疆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处在什么样的位置、糅合着各民族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什么样的情结等，这都需要通过《天山》历史的“横向时间”的文学断面呈现而被认识和理解。

二、新疆当代文学生成前的社会结构性背景

美国东方学家、区域研究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1934年8月号的 *Asia* 杂志上发表了题为“Where Three Empire Meet”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拉铁摩尔对新疆的历史和当时的状况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分析阐释。他认为，从经济上看，新疆“是中国领土最大的一个单位。域中大部分是荒芜之区，而那些膏腴的区域，却是特别的富庶。由于地理上的形势和物品生产关系，它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贸易单位。许多世纪以来，人民都是彼此互市于境域之内；外方的贸易多是一种副品，并不是绝对需要的。这是它得以保持平静孤立状态的最大因素。”^① 拉铁摩尔的分析是比较客观的，新疆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地域经济前提条件下，其政治、文化状况必然相对落后，就汉文化的发展而言，与内地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是因为在新疆，“汉族之散居于这一省的，或许不及二十万，因为内战和交通不便之故，他们和本部隔绝，假如我们想象英国人在印度与母国隔绝的状态时，其情形正同。此外，这种隔绝，亦使二十年来中国流行

^① [美] 拉铁摩尔：《新疆问题的观察》，郭家英译，天山，1934，1（2）：23。

的革命思想和政治经济各方的改革,对本省只有最低限度的影响。”^①拉铁摩尔的这段话与新疆的实际可能不尽相符,但是拉铁摩尔同样也认为,新疆的相对封闭并不会使其成为一个与现代化进程无缘的区域。显然,在20世纪新疆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边疆区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影响,“边疆区域”的特殊性决定了新疆在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呈现着多元丰富的色彩。

20世纪中国新文学是以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城市的生成、培育和发展为基础,并随着中心城市的形成、扩张而诞生的。“中国新文学的形成过程是和大批知识分子从边缘区域、乡村以及海外向北京、上海、南京等都市流动和聚集的过程相伴随的。由于大学、报刊和部分国家机构为根据地,逐渐地形成文学和知识群体。”^②显然,新疆新文学的形成与此是有差异的,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现代中国的边疆或少数民族区域与内地新文学的中心、热点话题却始终若即若离,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经济、政治、民族、交通、教育、宗教等一系列的因素,中原内地的文化与新疆这一区域的交流不够,内地的人口向新疆流动极少,在新疆人口的民族构成中,汉族人口不占优势,与新疆本地的少数民族文化比较,这里的汉文化在规模上是处于弱势的。这一切都使边疆区域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往往呈现出与内地主流文学发展阶段的不同,而这种不同更多的是迟滞和落后。就新疆而言,在1919年北京、上海等内地城市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之时,由于新疆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相对落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发育欠缺,新疆的社会文化生活还停留在封建社会的时代,在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影响下,新疆的文化事业极其落后。对此,民国时期研究新疆问题的学人说:“在科学昌明的今日,整个中国文化已经是落后,所以求使中国文化现代化,乃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新疆因为远处西北,交通不便,其文化层实又远比中国本部为落后。这个话并不是说新疆人民是一个不开化的野蛮民族。反之,他们很早就发达了高度的文化,但是因为地理的、宗教的种种关系,他们的文化却又早已停滞而僵化了。加以近几十年来,新疆的政府当局采取一贯的愚民政策,他们用尽种种方法以杜绝各种新知识的输入,不用说全省的教育机关不健全,就是连外面的报章杂志也不许自由输入,因为政府当局只有把新疆弄成一个与世隔绝的黑暗

① [美]拉铁摩尔:《新疆问题的观察》,郭家英译,天山,1934,1(2):24.

②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2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500.

大陆，他们才能任意地宰割群众，而不致引起人民合理的反抗。”^①在这里，傅筑夫认为当时的新疆是一个生产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在他看来，“老实说，新疆人民现在所需要的是知识的充实与团结能力的发展，而不是夸大的独立”^②。在20世纪，对新疆这样一个独特的地理、多民族区域来说，有人认为只要抓住交通和教育这两件大事就可以使新疆长治久安。就新疆的教育而言，因为“教育的功效，不但能启发人类的智慧和提高社会的文化，并且能沟通、融洽各种民族间的情愫和隔阂，新疆本有人种博览会的称谓，欲求各民族间的感情如鱼水一般，除励行教育外，别无他法。民族间的感情，如能达到融合无间的地步，则一切政治上的措施，自不难收事半功倍的成效。因此，我以为新疆政治永久健全的基点，不在武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外交手腕的灵活，而在国民教育的普遍发展。新疆过去教育，既甚幼稚，人民相互间的感情，自易受外来的诱惑而恶化”^③。现在看来，这个说法可能有点一厢情愿，但维持新疆的稳定和发展最重要的是现代文化的认同，而现代文化的认同基础就是现代教育的进步。虽然当时关注新疆问题的国内知识分子们是如此忧虑、殚精竭虑地看高现代文化教育问题，但是新疆现代文化教育的实际状况却是十分令人担忧的。“截至1919年，在杨增新的愚民政策的统治下，全疆只有通俗图书馆四处，藏书仅1200多册，全年的图书经费不过800元，文化事业极其落后。”^④而当时新疆的教育，除数量极少的汉文官办学校外，北疆各地还保留着一些前清的私塾，由于交通不畅、信息闭塞，教学的内容依然是孔孟经典文本，在当时，新疆的汉语白话还没有得到普及和推行。除汉文学校之外，少数民族的子弟大都是在经文学校就读，课程主要是《古兰经》的教规、教义等，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对于近现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和科学文化体系都几乎没有接触。例如，据1923年的统计显示，新疆全省“有国民学校、高等小学以及其他学校一百一十三所，初级中学和师范学校一所，学生三千九百五十五人，师范学校四十九人，教师一百四十四人”^⑤。到1934年时，“新疆全省高等教育仍只有一法政学院，中等教育有

① 傅筑夫：新疆的民族问题。天山，1934，1（3）：4。

② 傅筑夫：新疆的民族问题。天山，1934，1（3）：7。

③ 夏赞益：新疆建省的总检视。边铎，1934，2（1）：22～23。

④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简史（第3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58。

⑤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简史（第3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54。

师范中学各一校，初等教育虽称全省五十余县已普遍设立学校，然最好县份只有三五校，其下焉者，则仅有一校；统计新疆全省学校之数量，恐与内地一大县相若，全省学生人数，则不及内地较大学校之一校，女子教育原仅有迪化县立女子学校，现改为省立”^①。1934年，作为教育部特派员的黄文弼在几次来疆考察后谈新疆教育的概况时说，新疆的学校本身极少，“而且这些学校差不多以汉人求学最多，维回等虽也有上学的，但为数很少，多数是只求念念可兰经便成。新疆全省每年教育费用合华币3万元，教职员的待遇可怜极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学生共五六十人，由北平俄文学院毕业的学生为教员，也有很少的俄人当教员……新疆省有一个最大的困难，便是不但教职员参考书缺乏，就是学生的教科书也是少得很，学生程度低下，这也是一个原因”^②。作为一个边疆区域文化、文学之根的教育基础是如此状况，要进行现代新文学意义上变革的主客观资源条件如此匮乏，那么边疆区域文化和文学上的落后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至于少数民族教育的情况，更是与近现代教育内容相距甚远。现代社会所谓的基础教育即读写算能力的教育和公民教育在新疆的少数民族教育中是微乎其微的。^③ 杨增新、金树仁统治时期的新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非常落后，政府不允许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办学，却允许宗教学校随意地存在。显然，政府是在封闭具有近现代教育内容的学校。对于当时的少数民族学校状况，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吾民本身所办之学校，具有高级初级两种：（一）初级回文学校（Mactob）墨克托部：此类学校大多为阿訇所办，纯为宗教性质，其课程计有七种：（1）回教仪式研究，祈祷文之背诵与论释，（2）教阿拉伯字母，（3）可兰经（最后数节），（4）可兰经（全部），（5）苏巴阿喇亚尔^④（宗教诗），（6）那哇夷^⑤（宗教诗），（7）和甲哈皮斯^⑥（宗教诗），以上七种皆为必修课程，学生须全部修竣后，始可毕业，惟学生之毕业期限无定，常视其智力之高下，以决其毕业之先后。上列七种功课中，前四项为阿拉伯文，五六两项为土耳其文，第七项为波斯文。教员教授法极恶劣，只合学生死记背诵，食而不化，不讲

① 紫庄：新疆问题的重要性。西北春秋，1934（9）：3。

② 教育部特派员黄文弼氏谈新疆教育概况。开发西北，1934，2（5）：32。

③ 在新疆的阿图什地方志中，记载着当地的维吾尔族先贤在19世纪末开始自发地进行民间现代新型教育的启蒙。

④ 苏巴阿喇亚尔，即苏皮·阿拉亚尔，17~18世纪中亚著名苏菲主义诗人。

⑤ 那哇夷，即纳瓦依，15~16世纪维吾尔族著名诗人。

⑥ 和甲哈皮斯，即霍加·哈菲兹，14世纪伊朗著名诗人。

解其中精义，亦不教令习字，故实际上于吾人智识方面实无多补益。此类学校办理成绩异常腐败，教员资格不限，任何穷极无聊之宗教士，皆可随时租屋一间，自行设立，无须向政府立案，政府亦不加干涉，任其自行增加，故各县中此类学校几已满坑满谷，惟新省一班有识青年，多不以此为然，盖其数目愈增，将愈阻碍吾民之进步。（二）高等学校（Mederasa）：此类学校，各地均有，大都为富商所捐设，规模宏大，设备较周，附有寄宿舍，可收外地学生。每年教员俸给及学校经常一切开支，皆为富者所捐赠。其中课程内容亦绝为宗教性质，除穆圣历史及阿文波斯文外，别无其他科学智识，教授法亦甚死板，不令学生习字，故甚至毕业后，即一普通函件尚不能作。学生毕业年限无定，有在该校习读至廿三十年以上者，结果，养求一班极富顽固性之宗教士，与全民智识之进步，亦无任何补益。”^① 这样的少数民族教育状况显然是无法适应 20 世纪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所以当时有人疾呼：“开发西北之基本的并且最触目的需要即促进回民教育……实用科学教育尤为重要。”^②

民国这段时期新疆的普通教育尚且如此，其他具有近现代性内容的社会教育、大众教育就更谈不上了。在这样的状况下，欲使人民不浑浑噩噩、愚昧无知都不可能。“在绝无仅有的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中，一切设备无不因陋就简，有时因师资缺乏，科目被取消者亦正不少，如此敷衍，无怪高等学校毕业生只能及内地中等学校的程度，而中等学校毕业生只能及内地高小程度了。该高等学校的毕业学生，颇被人重视，就是中等学校毕业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很高呢。此外新疆仅有一图书馆及博达书馆，而图书馆的藏书又古老不堪，博达书馆虽以介绍文化为目的，亦因交通不便，颇难发展。杂志报章更少见到，所以一到新疆好像闭起了眼睛，于世独立了，听不了国际事变的扰攘、国内政治的纠纷，但实际帝国主义都在新疆制造着方兴未艾的战机。现在新疆一般文人还只知做歌功颂德的臭文、断烂朝报式的诗章，据说白话文传到新疆还是近几年的事。”^③ 所以，1933 年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罗文干到新疆后曾经说道：“新疆无文化，只有武化。报馆并无一处，亦无一人敢不要性命去办报纸。”^④ 教育的落后表现为新疆社会文化观念的普遍陈旧，现代意义的媒体企业在新疆无法建立，因为“边疆民众智识极低，大都无读报能力，故如不从教育方面着手，徒然提

① 艾沙·新疆教育之回顾与瞻望。矫如述译。边铎，1934，1（3）：22~23。

② 宋子明·促进回民教育与开发西北。之随译。晨熹，1936，2（4）：25。

③ 紫庄·新疆问题的重要性。西北春秋，1934（9）：3。

④ 郝公玉·西北的青年。西北春秋，1934（1）：9。

倡新闻事业亦属无用”^①。同时，个人办报馆就要伸张社会舆论的公正而不顾及自身，这在当时的新疆专制政治统治之下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政治愚昧黑暗及统治者极力清除异端思想的新疆，当时新疆社会的知识阶层，特别是汉族的知识分子、资本经营者，很少考虑创办现代媒体，而没有众多的现代媒体出现就没有新疆现代文化的诞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些教育、文化的落后都延滞了新疆现代意义上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但是，对新疆而言，无论处于如何封闭、落后、孤立、隔绝的状态，都无法拒绝外来新兴势力的影响，这个新兴势力就是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现代化是一个以空间层次推进的过程，空间作为一个自然区域而不仅是一个行政区域，还会更多地受到这种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和冲击。这时，理解新疆的社会历史或问题，需要我们把它的放在一个更大的空间层次上去把握，而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个主权在京的边疆行政区域，因为它首先是作为一个自然区域而被我们打量、认识的，作为自然区域的新疆在20世纪必然面对着来自各方新兴势力的挑战。“现代历史中，中国或其他国家不再由于大陆或海洋的阻隔而孤立。新兴势力就历史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的疆域和它的边疆地区都清晰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新的普遍力量超越了远东及世界各地的地理、民族的及文化的孤立性。”^②历史的进程确实如此。如20世纪以后，“新疆固有成为苏联囊中之物之势，然尚有南疆与接界之英印，鹰瞵虎视，欲排斥苏联而代之。英之抱有野心，已非一日，其‘大西藏主义’实包括新疆在内。至于日本，亦有其所谓‘满蒙王国’之大计划，其辖境非止于满洲及内外蒙古，如新疆、西藏以至山西、四川、甘肃亦皆包括在内”^③。当时有人忧心忡忡地说道：“新疆土广人稀，资源丰富，惜国际环境，强邻环伺，东西邻邦侵逼日急，大好河山，将成为东北第二，地图为之变色，加以苏联势力，根深蒂固，英国自印北上，日人由东西进，三强竞逐，愈形尖锐化，外来压力，日趋严重。”^④但是，由于20世纪的世界史是一段全球现代化持续推进的历史，也是现代性不断进步的历史，所以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区域和角落都无法避开本土的现代化进程，虽然由于各自本土的差异万千，对现代化影响接受的程度各有不同，但都在全球现代化的撞击下或多或少地发生着改变。20

① 何名忠：《发展边疆新闻事业刍议》，《边疆》，1936，1（6）：9。

② [美]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0。

③ 赖微：《俄英日争逐下之新疆》，《边疆》，1936，1（1）：5。

④ 何璟：《苏联势力控制下的苏新关系之剖析（下）》，《边疆》，1936，1（9）：16。

世纪 50 年代前的新疆社会历史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内地和周边国家的多种现代性意识和“介入性力量”的影响渗透下，新疆也在开始着自己的现代化启蒙进程，这一进程给新疆的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转变。

当新疆进入到盛世才执政时期（1933—1942）时，从中原内地来到新疆的汉族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以前，这既有抗日民族战争带来的人口向西部流动的特殊契机，也与盛世才在政治上的表现和实际执政效果有关，当时新疆的社会政治生活已到处充斥着革命、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抗日民族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氛围。1939 年 4 月 9 日，《新疆日报》曾有这样的报道：“在今天，新疆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有无限发展前途的新疆了，这就在文化前途方面说来也是如此。为要使新疆文化更加发展，为要使新疆在文化上也成为抗战的重要后方，在督办主席领导下，昨天新疆成立了文化协会，以沈雁冰先生为委员长，这个协会在督办主席正确领导下，在全国文化界前辈沈先生的指导下，无疑的，将大大地提高新疆各族民众的文化水平。”^①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新疆的新文化运动确实是蓬蓬勃勃地开始了，新疆人在戏剧、文学、文艺批评等领域有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快速发展和跃进。

同时，由于受紧邻苏联的特殊地域性及跨境民族关系的影响，新疆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到处都充斥着苏联社会主义，对苏联而言，它时刻不忘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莫斯科当局在新省增加他己身的利益，其主要目的，为抗衡英日对新之阴谋”^②。苏联人一方面要通过新疆抗衡英国和日本势力的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要通过新疆搜刮更多的资源来发展本国的经济，实现自己的强国计划。当时“新疆所生产的原料，是以苏俄为其最重要的顾客，而新疆所需要的日用品，亦是以苏俄为其最大的供给国。伊犁一带的森林，亦多为苏联人所采伐。其所采掘的金矿，亦均为苏俄所吸收；新疆的经济权可以说完全操在苏俄之手。1930 年 4 月，土西铁路^③业已完成，1932 年，苏俄的第二次五年计划又已着手实行，苏俄向新疆垄断的形势，愈见巩固。中国如不急求对策，最近实将来，新疆在经济上、政治上均将为苏俄的藩属了”^④。“新疆是显著的苏维埃化，大部分地方简直可称为苏

① 短评：新疆文化协会成立了。新疆日报，1939-04-09。

② [美] 巴敦：美国人眼中的新疆。吴伟英译。边疆，1936，1（4）：7。

③ 土西铁路北起西伯利亚铁路线上的诺西比利斯克，南至当时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全长 2 519 公里。该铁路平行环绕中国新疆边境 700 多公里。

④ [日] 侯厚吉氏：新疆与苏俄之贸易。张觉人译。天山，1934，1（1）：47。